



人大重阳论坛实录

第四期

房宁：

智库建设与中国发展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四日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办的一所现代化智库。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著名金融学家陈雨露教授任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立足人大，放眼世界；把脉金融，观览全局；钻研学术，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大众”为宗旨，力求为国家发展培养和输送高级金融人才，立志打造一个以“大金融”研究与传播为核心目标、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智库，最终实现金融报国、知识报国的宏愿。



主讲嘉宾：房宁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嘉宾：李未柠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副所长

重阳论坛实录

重阳论坛
重論壇

王文：

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这个炎炎初夏来到人大重阳。今天是重阳论坛第四期，可以说这一周是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的讲座周、会务周，每天都有一场思想盛宴。重阳研究院是人民大学一个对外公益性的开放交流的平台，现在已经举办了第四场论坛。人大重阳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单位，成立于今年的1月19号，人大校长陈雨露教授是我们的院长，我是这个研究院的执行副院长。

重阳论坛今年举办三期以来都非常火爆，今天也是一样，还有一些人还在路上。

今天我们请到的主讲嘉宾，很多人只要对政治学感兴趣、对中国思潮感兴趣，都非常的了解，我就不用过多的介绍。在我心中，房宁教授就是国师，对于中国整个政治学、政治思潮包括决策的影响，我认为还没有第二个政治学研究教授能够超过房宁老师。

今天的题目“智库建设与中国发展”，我认为房老师是最适合来讲的。下面有请房老师演讲。

房宁：

非常高兴和大家在这里见面，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邀请，感谢执行副院长王文同志，他是我的好朋友。今天有这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对一个最新发展动态的领域——“智库的问题和整个国家的发展”做一次交流。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今天看到一些年轻的面孔非常高兴。从这个话题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话题，尽管智囊这个词在中国汉代就出现了，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以后特别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是一个智库发展的时代，但在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崭新的话题。我的意思是说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也是很初步的、很年轻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和同志们、年轻朋友们在这里交流是完全对等的，我也特别想同大家有所交流。

今天的话题有两个方面：智库和中国的发展。从叙述上，我倒过来讲，我先讲讲从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小半年的时间，我们在发展领域中的事。因为今天的重点还是智库，所以我想讲讲这半年对中国发展的一些感受，当然是和智库有关的，然后再重点讲讲智库的发展，所以，今天在智库里谈智库了。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全国人民很期盼，在这之后非常有意思，有了很多的说法。比如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的说法“中国梦”。“中国梦”是一个名词，前段我们所里写文章，讨论的时候还注意到这个





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就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后来我们意识到不能这么说，要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已经是一个专有名词了，像这样的一些新名词，还包括反腐倡廉等方面。

我谈谈这半年来的感受。我觉得这半年以来，从中央领导集体来讲，因为中央领导集体反映了中国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同原来的中央领导集体相比，尽管执政时间还不长，但还是表现出了一些特点。4月19号是我第二次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服务，三年前，也就是在2010年9月，17届中央政治局学习的时候我也有过一次服务。这两次服务的经历不是要讲什么奇闻异事，我就说一点直接的感受，因为很有意思。两次参加了两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学习，一个是17届，一个是18届，感觉恍惚昨日，只不过昨天坐的是胡锦涛总书记，今天坐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一样的场景，一样的房子，有的人是一样的，有的人是不一样的，主持词前后也都是一样的，我就情不自禁的对这两代领导集体做了一些比较。我有两点体会：

第一，他们更加的勤奋。17届的领导集体都是特别好的人，非常的民主。但是我觉得这次也许和年轻有关，特别的投入。我们这一次领导集体中的习总书记、李总理，包括现在张委员长、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同志、张高丽、王岐山等等都非常的活跃，精力非常的旺盛，觉得他们有使不完的劲，他们非常有

紧迫感。这是第一个印象。

第二，他们更加注重学习了。以我个人经历来讲，其实三年前这张桌子上也有习近平同志，也有李克强同志，也有王岐山同志，还有其他的人也在，有些也是上一届领导集体的，也是上一届的中央委员政治局成员，但是这一次也许是因为他们担任了更重要的职责，非常注意学习，广泛的问策。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一个智库，我们现在也是忙得不可开交。我们有三大服务对象，中宣部、中组部、中纪委。其他的包括像港澳办、国台办。现在的会议很密集，而且都是在征求意见，都是问策，问的都是最现实的问题。很多部门真的是不会就学，不懂就问。作为中央领导集体他们已经代表中国最高智慧了，但实际上他们非常的谨慎，非常的注意学习，非常的注意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这是我对十八大以来这一代领导集体的两点印象，我相信这和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

我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说中国的发展现在进入了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当然这个阶段不是今天才进入的，但是现在处于这个阶段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我把它称作“战略的时代”。

什么是“战略的时代”呢？我听到一个小故事，当然现在没法求证，因为讲故事的人已经不在，是别人转述的。也许是一个传言，不是很准确，但是我相信即使是传言，它背后也会体现了一点儿什么东西。因为从毛主席的一些论述中可以看得出来。

当年毛主席的时候，毛主席晚年在他周围有几个助手，都是外交方面的助手，大家都清楚，一个是他的亲属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一位是章含之。有一次王海容和唐闻生，因为他们当时也很年轻，所以爱争论。这两人有一天争论起来了，就去找毛主席评论了。为什么争论呢？我从小是在大院里长大的，我在院子里跑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个长着花白胡子，戴着头巾的男人，叫做阿拉法特。然后他们俩就为这个阿拉法特争论起来了，要让毛主席评论。据说毛主席听完以后一笑，美国人出钱出枪武装以色列，苏联人出钱出枪武装巴勒斯坦，关咱们什么事？

不能说毛主席的时代没有战争，毛主席的时代当然有战争。1952年国庆，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让当时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升旗时讲到，打败美帝国主义及一切走狗，美国的走狗很多了，我们现在不能提这个。这个故事没法求证，但是毛主席和基辛格的记录，包括基辛格的回忆录中，毛主席就说放大炮。当然这就是一个战略，放大炮也是一个战略，因为当时中国很困难，难以自保，包括当时打开中美关系这都是大战略。但那个时候，拿国际战略来讲，中国是站在世界的外围，毛主席的战略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民自保就不错了。当时在美苏之间运筹帷幄。那时还谈不上真正深入到这个世界上，处理这个世界上双边、多边的关系，因为当时是闭关锁国，出不去。当年尼克松总统来访问的时



候，他觉得有一点很震撼，就是他从钓鱼台国民馆去八达岭长城参观的时候，早上一起来银装素裹，下了一场大雪，他想可能去不了了。但周恩来邀请他去，他就看到突然在这白雪皑皑的世界里扫出了干干净净的一条路，一直通到八达岭长城，他顿时被中国的力量所震撼，这也是一种小战略。我非常有幸那天早上六点起来就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扫地。

当时尼克松来了，全北京市的市民都要进行教育。外国人来了你要对他怎么样，我们记住一句话“不卑不亢”，现在我们大家都不卑不亢，不用教育了。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我们说大国和强国，这里面是有标准的。但这个世界和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中国干任何事情都非常复杂，不管是外交内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都非常的复杂，包括应对媒体都是很复杂的事。这个时候光靠直觉、光靠经验远远不够，中国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人类知识的基础上，建立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当然这首先也包括了中国的知识和中国的实践。对于实践经验的探索总结，对于经验的提升，也就是理论的创新，还有待去验证。

作为在智库里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我当然知道现在的事情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所以，这些问题就是中国的发展必须有智库这样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它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智力的平台。中国的发展越来越需要智库，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于智库。当然，中国的

智库也源自中国的发展，正像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十年，从美国到欧洲最早的智库，同他们发展起来的时候是一样的。他们的发展也是应运而生，也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社会的需求，而今天的中国有这样的需求，有这样的条件了。所以，我相信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对智库要求很多的社会。当然从我们官方的语言和政治的语言来讲，也许需要决策的科学化以及民主化，需要集思广益，需要广泛的征求意见，而且需要对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意图进行梳理、归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民主集中，再集中成国家的智慧。或者把民智民力集中和转化为国家的意志、国家的力量和国家的行为。

在座有很多年轻的朋友，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发展，这样的—一个时代也会为很多有志于报效祖国的青年提供一个宽阔的舞台，诸多的机会，相信包括我们重阳金融研究院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也在广纳贤才和凝聚力量。这是我对中国的发展和智库的关系所谈的一些感受。

下面结合我的一些研究，当然我做的是文本研究，也包括自己的一些工作经验，我想讲—讲智库的一些情况。我原来在高校里工作，教了很多年的书，2001年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做主管科研的副所长，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从事智库的研究，这是我的工作了，大概现在十年都过去了。

在座都是学生，我也是当老师出身的，我掉个书袋子，简单的说说。首先，智库是一个通俗的说法，

智库的规范性概念应该叫做“政策咨询规划组织”。因为智库当时是一个代号，二战中美国的参谋部里有一个策划的机构，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智库，它叫做 had（音），实际上就是保密室的意思。而且这个人是参谋、工程师和情报人员。所以，它是对战役、后勤和综合的战役情报进行分析的机构。它工作的办公室就是保密室，这个是比较核心的，这有点像我们大使馆里有保密室—样。后来人们给它加了一个“hh”（音）就叫做智库了，但它的本意是政策规划和咨询机构。

智库的服务对象简单说也定义得很清楚，服务对象就是政府和企业。我说的都是西方的情况，中国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还要探讨。这个可以多说—点，因为我—直思考—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讲我的背景，因为也有这个关系，我过去在高校，高校也有科研，在研究室里也有国家社科资金，也做科研。像我们重阳金融研究院也是高校的，这可能有点特殊。我觉得它实际上应该叫做—般文化机构，也包括社科院。社科院很早以前叫做学部委，我很小的时候，还到人民大学来串联。你们没来社科院之前对社科院有什么印象，当然这个印象会变。过去我没来之前，我对社科院的印象是文化机构，这没有什么太特殊的。现在创新工程以后它实际上在转型，从—个—般性的文化研究机构转向—个现代的智库。

现在的智库和非智库，包括高校和其他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服务对象不同了，按照交往的理论，



交往的理论在我看来是马克思主义最早提出的，它认为什么都在关系中。这个交往的理论就有主客体，按照这个说法，智库就算是主体了，服务的对象就是客体。说实在，学习的研究或者普通的社会科学研究、学术研究说到底还是服务学生的。今天我这个话有的人可以理解，有的人还不一定知道什么意思。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刊物，过去我也发表过文章叫做《教育与研究》，其实大学里就是教学与研究，它的问题来自于教学，它的研究也是服务于教学的。它更多的是研究知识，它的方式是文本，主体往往是个体、一个人，目的是服务于学生。当然这个学生是广义的，不见得是大学里的学生，有可能是所有对于知识有需求的人。

智库本质上不是服务学生，而是服务于政府和企业的。它主要创造的产品是做法，是政策，是法律，甚至是制度。这是它与一般研究在投入产出、服务对象上的区别。按照我的说法，我们经常为了通俗来表述我们的工作。

有时候给所里研究同志讲我们的研究对象，例如研究政治学的，我们会有三个定位：马克思主义坚强的阵地，社会科学研究最高学术殿堂，党和中央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当然这是吹的，这三个都需要努力。这三个定位，按照我们所通俗的说法是学者得有三个本事。第一个是争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那么我们就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发出我们的声音。现在出了一个说法叫做“宪政”，我们也要

谈谈我们的看法；“国家与社会”是热门话题，因此我们把第二个称为政论。思想库、智囊团就是问策，香港2017年要选举，现在有人说什么叫做普选，是一人一票还是分组别？还是推荐委员会？等等。针对财产公式的问题，重阳金融研究院的同事做了一个课题，叫做“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目前有关这个领域和这个话题下的最新知识全在那本书里。

问策有策论，当然还有文论，也就是我们写的一般性的学术论文，或者这个世界呈现出的几个法，说法、做法、想法。比如《宪法》、法律、政策，领导人的讲话，这都是说法。说法很重要，但是和做法是有区别的，不是说的都能做到，说的和做的是有差距的，甚至有的是说说不做，有的是做了不说，有的是说了部分的做了，有的是做了部分的说了。所以这两者都是有差距的。研究一个世界不能光通过说法来研究。例如财产公示，就有这个问题。很多人一说到国外的财产公示，好像国外是一个概念，其实国外有100多个国家，而你说是哪个国家？哪个国外？再就是每个制度会有相应的法律，例如法国有法律，但法国是不是按照这个法律做的呢？显然不是，就是按照这个法律做的，它的效果怎么样呢？也不知道。所以研究一个社会光研究说法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做法。

说法和做法背后还有想法，人的主观意志和客观现实是对立统一的，主观意志来自于客观现实又影响客观现实，但客观现实中的实践

不可能完全实现它的主观意志。所以还有一定的差距，不一定想的都能做到，不一定事事心想事成，那是大家的愿望。像这些问题都是智库所要面临的。

在我看来，传统的社会科学基本上是研究说法的。包括我现在做政治学研究，我看绝大多数文章都是说法，都是关于说法的说法，（笑）这些就是论文啊。李源潮同志把它叫做拍脑门、查资料、编材料。（笑）所以，欧文·浩特（音）和我在谈话中说，他说“library professor, study on his library”，抱歉我这蹩脚的英语还能让你们听懂



太不容易了,好多美国人都听不懂。欧文·浩特(音)是提出中国经济崛起最早的人,他其实就在兰德公司工作,兰德的总部就在加利福尼亚,大家也知道兰德的历史,后来他老了就在哈佛。我们这次谈话就是在哈佛的 bangety (音) 的饭厅里,但是那个卖饭的人年龄都比较大,我估计会比较贵。开个玩笑。

九十年代,他就说中国要崛起。这在当时很了不起。如果是现在说的话就是一句废话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再说就没有意思了。其实重要的事情一旦被认可了,它也是重要的。他说明天下雨,果然

下雨了,他会说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明天没下雨,他还是那句话,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所以,千金难买的是永远对,你说昨天的事都说得头头是道,这个当然也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把明天的事说对了。

欧文·浩特(音)当时这么说,美国的学者都笑话他。但他事后总结,他说当时我和这些人有什么区别呢?他为什么能知道?当时有很多研究中国的大学生,这些人研究中国,他们就看朱镕基 speech,看不懂。而他研究中国经济,就先跑到中国去,访谈朱镕基周围的这些

人,回到美国再看朱镕基 speech,就听懂了,然后再看中国的那些报表。智库研究就要直接访谈,而不是通过文本。这就是有心人,有科学思维的人能够见人所不见,他能观察到这个事务背后牵扯的前提,事物的联系性和内在的矛盾性。

文本既是你达到真理的一个途径,但其实也是障碍。你研究历史不能不看《史记》,研究中国经济,你现在要看李克强 speech,但这个往往既是通道又是障碍。为什么呢?有三条:

第一,它不全,它不会什么都给你讲。政治特别是现实问题,它



不会都跟你说，有很多重要的东西要靠理解。

第二，你看不懂。因为社会的语言体系有三个，一个是政治话语，一个是学术话语，一个是生活语言。特别是朱镕基 speech，江泽民 speech，一定是政治术语，例如江泽民就提到“三个代表”。习近平 speech 中又提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是什么意思？很多人看不懂，说这都是大话套话空话，话的确很大，思维很空，一套一套的，但问题是它有信息。所以，政治学有一个研究政治话语的语言法。我去台湾看望一位很了不起的专家，他从五十年代开始看《人民日报》，每天都看，那真的是字里行间地去研究。政治

语言就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能指则指。你只要懂得它的结构，你才能够懂得它的含义。所以，如果只冷不丁一看，您还是看不明白，然后你就把它当成空话套话了。你看不懂，或者你以为你看懂了，实际上并没有看懂。

第三，智库可以说有很多类型，其中一种是所谓的倡导型智库，例如企业研究中倡导型的智库。罗马有一个智库，它就是要倡导新民主主义。过去的智库都是研究问题的，现在也有了研究形态。社会其实都有一种价值取向，它就是在倡导或者反过来说就是一种研究。所以，光看文本，不通过文本背后的经验对象是行不通的。换句话说，它的说法你了解了，你未必解它实际的做法，也未必知道它背后的想法。

智库的研究与其他一般研究相比就有一个区别，它一定要有三法：说法、做法和写法。因为智库的研究一定是在研究问题，一定不是去读书，不是去找各种资料，找完以后在各种资料中进行比对。当然这个工作也要做，但这不是主要的工作，如果它主要是这个工作的话，那么它就混同于一般的研究机构了。

智库的学者应该什么样呢？我就问欧文·浩特（音），后来我们就认定了，并发明了一个词，叫做“think converse honor”，我再说一些区别，例如按照职业来说，人民大学里有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陈先达教授，是我的老师辈。他有一句话，他说他的职业是教师，他的专业是哲学。这是对的。人民大学

政治学的教授也是这样，你的职业是老师，你的专业是政治学或者其他。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区别。

所以智库一定是研究问题的地方，以研究实际做法为主，产出政策产品为主。所以，的确是很不一样的，你不要以为一个教授从大学里调到研究机构就是智库了，这是两回事。我说的意思是从一个主体研究人的角度，研究工作的角度来研究一下智库。这就是现在智库的发展，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总结了西方的经验。因为西方的智库，它最早是像卡内基、洛克菲勒智库等等。他们当时就想，高校里教师主要的工作还是教书，很繁忙，是一些重复性的劳动。那能不能把这些都集中起来？那时正好是美国工业化加速的时期，从发展阶段来说有点像今天的中国。这个时候有很大的社会需求，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矛盾也日益突出，那么相应的社会的政策、法律、执行难度也很大，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捐出财产组织各种智库。因为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智库基本就产生于二十世纪头十年到二十年，你可以查查现在这些著名智库，很多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

这是社会的需要。恩格斯说过需要是十所大学，都能够推动科学的发展。所以，科学的发展首先是需要，再一个是它的组织，以及高投入。但智库的组织很少。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的智库基本上是10%-20%的研究人员，剩下的主要都是行政辅助人员。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几百人中真正的研





究员不多的，这也是一些智库很大的特点。

好的研究是不追求数量的。作为一个科研机构的管理者，我也有这个体会。我们的研究报告，尤其是给中央写报告，都是很短的。我们很多人切磋，写策论。策论如果最长要写3000字那你就相当笨了，这么点事用了3000字不是坑人嘛。一个很复杂的、很重要的社论，你要在1500字内说清楚，所以说长不是本事，说短了才是本事。所以，好的智库不追求数量，主要是能解决问题。像著名的兰德公司不就是一句话吗？美国问，朝鲜战争中国出不出兵，他说出兵。其实这个没卖上钱，兰德要价两百万，但美国不相信，没有给他。后来我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当时中央情报局都把志愿军的俘虏抓到了，但还是不信中国已经出兵了，于是他们自己编了个故事，说朝鲜有个水电站，中国的兵来保护那个水电站了，所以，他抓到的志愿兵俘虏是来护水电站的。怎么可能，朝鲜都让我们占了，水电站还要护来干嘛？

好的智库，首先是不追求数量，其次是快速化。它绝对讲时效性，它不能十年磨一剑。尽管智库要强调综合性，因为战略要综合，但它也强调中长期和前瞻性。

总的来讲现在是一个战略的时代，科学决策复杂化了，所以它必须有一个科学化的智力的支撑。过去是凭着一些少数的政治家，他们的天赋，他们的经验，甚至他们的赌博来做决策，但现在不会这样做了。所以，就需要智库这样一个方

式，实际上这是现代决策的方式。

我再简单讲一下中国的智库。世界对智库有一个评价，这就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排名，这有点像70指数，两年公布一次。这次中国也有排名了，大概是这样的。世界上美国最多，大概是2000多。中国的智库其实也很多，但美国人认为对不起，中国自己说自己有2000多，现在又没有统计，而且中国的智库还没有蓝皮书，所以就要看宾夕法尼亚的。就宾夕法尼亚的报告来说，美国是承认中国智库的，最新的报告我没有看，但以前是70个。谁排第一，当然这不好意思了，是在下工作的单位排第一。而且我们这次会上还有人讲，排名世界第17，亚洲第一，错，是非美智库世界中的第17，就是说美国以外的智库我们排名第17，要算上美国我估计117差不多。我对美国没有什么研究，但是我知道的一些，包括我关注的，有的甚至是我访问的，我觉得美国和中国社科院比，至少有二、三十家肯定排我们前面。

如果是全球排名的话，也许美国人认为他们是第一批录取的，我们是第二批录取的，他们是985大学，我们是之外的。至少美国是这样看的。但各国各有各的国情，也各自有各自的优势。美国再牛，他能研究好中国吗？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国人应该给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看一下，将来咱们写智库蓝皮书，就拿给他们排，看谁排第一，谁排第二。当然这是科学，肯定要有一个标准。

但中国的智库还是比较复杂，按照中宣部的说法是五路大军。一个是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大概占了全部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教学研究人员的70%多，这不是一个很准确的数字，是大致的数字。那么接下来，就是社科院系统，社科院尽管没有垂直系统，但各省还有一些市都有社科院，从人数上来说，这大概是第二路大军；第三路大军就是政府研究机构；第四路大军是党校和各种官员，行政学院培训机构中的这些教师和研究者；第五路大军是部队的研究者，但是它是相对独立的。所以，一般分为五类大军。

这五类大军中应该说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局限性。比如从高校来讲，其实我已经讲了这个问题，高校的研究，确实要注意，不要脱离实际，不要做拍脑门、查资料、编材料的事。当然我们也有这些问题，谁也别吹牛，但是你别光做这个事，你光做这个事你就活该了。所以，高校容易脱离实际，容易纸上谈兵，但智库要解决实际问题的，你和实际问题粘不上边就很难走下去了。

再说说政策研究机构。政策研究机构在中国是有优势，因为它在第一线，而且它是政策的最后一道，他们有时候自我调侃，叫做“词臣”，他们就是专门起草文件的，包括法律、政策建议、人大的法律建议稿、领导的重要讲话。这个工作我也做过，就是把大家比较准确的东西用最精当的语言综合起来，同时还要照顾到语言的连续性和弹性。政策



研究机构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的特点：一是对策，因为他们有的就是权力部门和决策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整个决策的意图、机制和过程都了解。二他们比较了解各方面的说法，这和中国的决策体制有关。外国人不太了解中国的决策体制，说中国这个国家号称是一个民主国家，像吗？什么表决，举手都一致。网络上调侃说，有一个政协委员，有一个人大代表从来都没有提过反对意见，简直是不称职。其实外国人了解，中国无非和美国决策程序不太一样，体制不太一样，美国就好像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柜子里决策，我们也不是在黑箱里决策，我们是在外头决策。

中国提出一个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就吊出来了。我们总说调研，带着问题去做，从问题入手。问题是意识，其实也恰恰是研究的结果。很多情况下它既是研究的前提，也是研究的结果。有人问我，房所长你们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展怎么样了，我说我这儿哪有什么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什么叫做政治体制改革？我这里研究的就是干部人事制度、公务员制度、党的建设、党内民主、公推直选、党内常任制，行政区划、行政层级等等。政治改革是一个很笼统的范畴，就像研究组织胚胎学的医生讲的癌症和我们说的是不一样的，他说的是具体的一类病，不是一种病。我这儿也一样，政治体制改革谁能研究啊，那不成了宇宙的学者了吗？政治学到宇宙里去了，谁研究这个。这个问题你能研究出结果吗？

往往问题不是产生于研究之前，研究前的问题是特别笼统的，研究的第一阶段就是把问题具体化，真正问题点在哪儿，或者是在各种问题当中的要害是什么，那是真的要解决的。智库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先提出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然后评估政策。

但是中国的智库和美国的智库相比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们就认为美国牛？有人说，因为美国老大大啊，你老大你就牛嘛，所以你智库也多，你什么都多，你什么都好。其实还不太一样，美国是一个选举国家。在美国的这种选举政治制度下，它的决策分工实际上是两块，所谓的官僚与政客。政客基本上是选举专业户，就专门选举。当时里根当总统的时候，美国流行一个笑话，说美国没有总统，只有一个住在白宫里的演员。既然如此，那就干脆找一个好莱坞的退休演员来吧，（笑）果真是一个好莱坞的退休演员去当总统了。

美国的政客，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搞选举，就是忽悠，决策真的不是他的所长。政府里的人叫做“旋转门”，像胡佛研究所是共和党的影子内阁，平常没事了就在这个智库里待着，一有事就出任国防部长、情报局长。也就是说，美国的政客是搞政治的，所谓搞政治就是获取权力、权位，怎样通过选举把白宫的位子占上了，至于占上了以后怎么办？那是别人来帮助你的，形式上是有很多人的。所以，这就决定了美国的官员和美国的政治家是不熟悉政策的，所以他要靠他的党，

也就是一个选举的助选团。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就是管选举的，它就是一个选举的组织，一年到头的选举。美国总统每四年选举一次，美国这个党就四年出现一次，选举年的时候有这个党，没有选举的时候没有这个党。这也是和欧洲的区别，所以欧洲的智库不如美国发达就是这样。欧洲的党有它的智库。美国没有。

中国和欧洲又不一样，我们中国的干部本身就是智囊，他长期从政本身就对政策很熟悉，专门研究政策，还有机构。比如研究金融政策，说实在的人民银行有管理机构不管是周小川还是胡晓炼，这些人都是大学毕业就学的这个，金融他熟的不得了，研究政策他也知道这和美国的区别很大。

这样一来，高校和社科院这些单位没有那么大的发展空间。例如金融研究院，我就按这个逻辑进行理论的分析，它应该在人民大学、中国银行、还有更广泛的证监会、银监会之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政策问题一出，一般的中国的政党就找到这一个单位，多则十几个，少则三五个，以我不多的经历来讲，我经历过的从来没有少于过三家。而且中国是部级单位。有的时候多的能找十个部，像中宣部、中组部等等，然后各出一组研究者，分头进行调查，最后根据各方面的知识，不同的领域进行综合，反反复复修改。所以，中国的政策为什么最后大家基本都举手呢？也没法不举手。因为它整个的利益表达，博弈、最后的综合，这个过程都已



经完成了，这就是最大公约数了。你当然要同意，你要不同意早干吗去了？他还会反问你。

这和西方人完全不一样。因为西方人有的时候会问你们都同意啊？他们搞不定，就只有玩零合游戏。在白宫财政悬崖，他们进去关起门来吵，一出来大家都笑呵呵的，今天取得了建设性的话题，就是建设性的发展。底下却咬牙切齿的，奥巴马拍众议院院长的肩膀说，你今天过生日，我给你弄一个蛋糕，人家勉强地应付笑了一下。当然最后闹不定，就表决，一表决蛋糕就白送了，这个其实挺伤感情的。（笑）

我当一个单位的领导，我觉得不能表决的，你黔驴技穷才表决，表决以后回来都不开心了，不交流了，都走人了。这何必呢？弄得大家都不愉快，表决通过的人也很难受。体制不一样，文化不一样，我们一定要最大公约数，一定是意见充分反映，求大同存小异，最后大家肯定同意，要不同意就不能够表决，那就不成熟，且弄得折腾。

但是这些政策研究机构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它特忙，超忙，词臣，所以他最不务实的就是研究。我敢说这个话，研究室的人绝对没有我们政治所的人，没有我们社科院的人调研多。别看他们叫做研究室，研究室很少调研。我们这一年来在外面，社科院做了很多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有一次我们感动得不得了，有一个小女孩温文尔雅，姓沈是沈从文的孙女，人家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村寨里待了三个月，弄

了一身虱子回来，现在的年轻人谁能下这个功夫。就冲这个，我们这些老同志都很佩服。

我认为一个理想的智库应该是“三三制”的。三分之一调研，三分之一进行专题研究，三分之一做学术性，不太有明确目的的研究，打基础。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第二点就是研究机构有点唯上，有的时候他看上头的，按照西方的说法是不够中立，绝对的中立是没有的，但你要相对客观。这个说得容易，但很难做到。他们主观上也想这样，但事实上做不到，领导一看说怎么这样啊？就开始琢磨，您是什么意思啊？（笑）那这个东西你还用调研吗？还用你研究吗？领导就是这个意思，你就给他说说就行了，那就不叫智库了。所以，它不同程度上存在这样两个问题，这就是民间智库和其他智库生存空间问题。

第一，你是比较中立，客观的，你的心要想着国家，想着人民，想着党，你的立场、你的味道不对了，你不能老挑毛病找别扭。有人经常说，你没有政治压力？这个东西怎么写我是需要动脑筋的，但说实在的这十多年来我没有这种政治上的压力，哪些是可以说的，哪些是不可以说的，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遇到过，只是说这个话怎么说，这是有的，同样一个意思可以这么说，可以那么说，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意见是不能提的。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气氛很好，很亲民。

第二，这里面研究有大量的调

查研究，你真正可以把所谓的战略性的、前瞻性的问题适当的时候拿出来，这个是任何的研究所、研究室，政府研究机构、党政研究机构所没办法的，它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所以，重阳研究院这样的地方是大有前途的。

中国智库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因为中国越来越需要，党需要，国家需要，人民需要。我也希望重阳研究院，将来也能够应时而发、乘势而上，为我们的时代、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做出对得起自己的贡献。

我先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王文：

谢谢房宁老师。我在环球时报工作的时候，房宁老师多年来指导我们写社论，而且在多篇最敏感的社论时，房宁老师都是我们的高级顾问，如果没有房老师为我们做了那么多工作，环球时报的评论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几个月前我离开环球时报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创办重阳研究院，房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建议，今天又在这个场合给我们提出很多的建议，受益匪浅，再次感谢您。

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今天现场有几位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旋转门”的代表，从学界到政府；还有李未柠，中国传媒大学舆情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一名女中豪杰。

我们有请义桅兄和贾晋京做一个三分钟点评。



王义桅：

首先谈谈我对房老师的个人印象，我觉得他是非常睿智、幽默的，每次我和他谈话都能感觉到这一点。

我觉得他身上有中国话的气质和北方人的气质，我长期在上海，在上海比较时髦，喜欢用国际化的语言，反而忘了自己的话。

第二，他用的语言很通俗化，“中国在路上，美国在路口”，非常通俗易懂。

第三，当然最后还有实践化，他做了大量的智库的研究，所以，

之前我也专门请教过他讲中国政治。

他不是光讲这块的智库，他是把智库放在整个历史国家背景和体制上来研究，你讲到的欧美政党体制对智库的影响给我很大的启发，政党越发达的地区，智库越不发达。

房宁：

而且他们排斥。

王义桅：

德国也有基金会，他们很少有超出政党意志去客观的看问题。我

们研究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放在一个历史大背景下，尤其是政治体制大背景下看，超越问题的本身，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刻。

第二，研究智库是研究中国的学问，研究中国的知识，研究价值沉重的源泉。最近我在看《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傅高义有一个声明，“我曾经在中央情报局服役过三年，但我不代表中央情报局和官方的立场。”他的声明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他为什么看了那么多的材料，能够拎出很多东西，我觉得和他做过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和加工非常有



关系，而中国学者很少做过中央情报局，我在回国以后很多研究方法得益于我在欧美的一些训练。中国的很多使馆也是一种智库，它不光是研究中国国情。中国还是要多重重视调查这一方面。

房宁：

其实已经在计划当中了，中央现在从一些大学和智库挑了很多人到使馆里工作，这是李长春说的，政治学所必须派一个人，当三年外交官，实际上就是去学习调研了。



王义桅：

所以我们的智库走出去，我们的使馆是第一个走出去的，各国都有我们调研的人。

房宁：

外语也很重要，有的人外语不行。

王义桅：

但长期在国内，生活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看中国和看世界陷入一种境地，跳不出来。我有时候觉得国内人对中国没有信心，反而老外对中国有信心。

房宁：

看得多了。

王义桅：

所以，我觉得智库的发展对中国整个学术的进步和反思有进步意义，不光是智库本身为我们决策提供服务，从智库更深层的角度也是这样。

当然中国现在确实到了智库的

时代，就像中国要到了“中国梦”的时代，过去我们做着别人的梦在中国实践，现在我们和他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可以做自己的梦了。现在很多书叫做“替美国着急”，“替欧洲着急”，证明我们有这个信心了。我觉得中国的智库不仅仅肩负了为中国出谋划策，某种意义上也要为欧洲国家，为世界做出超越中国思维范围的贡献。

贾晋京：

我在2004年就见过房宁老师，当时是从北京到曲阜参加一个会议，那次会议叫做“世界思想家高峰论坛”。那次会议给我印象最深的特点是，讨论从孔子那个时代起，世界上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如何回答和解决不同时代最重要的问题。

从那之后我一直在追踪着看房宁老师的文章，房宁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文章特别具有分析性和系统性。系统性就是能够以很高的视角概括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所谓分析性就是能够很好的把问题点在哪儿概括得非常好，相信





今天大家都能很清晰的体会到房宁老师非常强的分析和概括能力。他不仅把逻辑性非常强，而且在用词方面都是一组一组非常对称的词，比如说政论、策论、民论、说法、做法、想法。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房老师对于系统性的分析，尤其是给我们讲的中美决策体制的区别以及在中美决策体制这种重大格局的背景下，处在一种决策咨询服务的智库应该摆在什么样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析性和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我经常看一些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以及美国政府的网站。如果让我来概括中美决策体制的不同，我把美国的决策体制叫做用研究报告治国，而中国就是用红头文件治国。就像刚才房老师说的，中国的金融系统里主要的官员周小川、胡晓炼就是这个系统里最资深的专家，在这种体制下当然是红头文件，他以文件的形式把政策大体上传达下来，一层层确定一个重要的政策制定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形成文件过程中的利益表达。

美国是研究报告治国。因为美国最后能够决定拍板的机构基本上是议会层，在议会层往往取决于来自于一些研究报告的报告，这个报告建立了A方案，那个机构有一个B方案，第三个机构有一个C方案，往往在这几个方案中进行表决，所以报告非常重要。

但现在中国面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发展机遇和过程，我看到非官方体制之外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市场发展，另外一个空间的这种发

展，实际上是中国好像很大程度上越来越需要适应来自各方面不同的智慧，这不仅仅是像上一届政府表达的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也有更深刻的政策表达，要宏观稳住、微观放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像房宁老师对中国系宗的概括，他下一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机遇，在这个系统内部和外部的生长都要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这是一个智库非常重大的发展。所以，就像房老师一开始讲到，我们处在一个战略的时代，在这个战略的时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环节，就是战略知识的生产时代。

提问：

我是华北电大学的，我是博士生，研究政治决策的。我想问一下，在政府决策中存在哪些问题？现在都说是科学化、民主化，但科学化和民主化就涉及到一个效率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还有您在做科学化决策的时候，到底是以专家的意见为主，还是以专家意见为辅呢？假如您说智库要做一

些决策的时候，会有一些唯上的观念，我们如何去做一些监管来抑制呢？有没有方法可行？

房宁：

第一个问题我没有听太懂，我先说后面的。

政府内部的研究机构或者作为政府部门一部分的研究机构，你说对它监管也谈不上，因为这是它天生的，它自己都想监督自己，但摆脱不了，也改变不了。

科学化和民主化肯定是有矛盾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很重要的问题，往往是被少数人所先见。民主化就是要尽量找大家的意见，这就是平衡点的问题。因为科学又离不开民主，而这个不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就没有这个问题，社会科学或者研究社会的政策，首先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把根本意义和长远意义结合起来，怎么把个别利益、局部利益和全部利益结合起来。

实际上一个政治体制好不好就在这个问题上。比如，美国的体制





能够比较好的维护美国的基本价值，即所谓的自由、人权。你说什么叫做自由人权？那枪的问题怎么看？有拿着枪说自由人权的吗？所以，它是有矛盾的，但它实际上是不同领域的问题。基本价值应该是所谓的民主化，民主化不是指基本价值，民主化是指能够把大多数人的意见结合得比较好，又能够为对方接受。能够比较快的见效益的，这就叫做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统一。也就是说，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有一种合理的提炼，这就是科学化和民主化的统一，当然这都要到具体问题上再看。

政治学研究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都基本差不多，有三大方法：

一是历史法，像过去你研究什么事，先要看过去历史上有没有什么事，肯定要有先例，研究过去的历史，肯定要比对，当然也不等于简单的重复。

二是个案法，我们要找一个典型。例如从温岭的民主恳谈、乐清的人大新政来研究基层民主。这就是一滴水反映太阳的光辉。因为政治研究有一个困难，社会科学有一个困难，就是到场的问题，整体不好把握，我们往往就从一个点上，用这个点来推断整体和全体，这也是一个方法。

三是比较法，比较法的好处在哪里？研究宏观问题用比较法，比如说中国的发展。三个问题：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是三个哲学问题，也是进每个大楼前，保安要问你的问题。（笑）你从哪

儿来，到哪儿去你都不知道，你最多能说明过去，现在都不好说。这样比较法就重要了。拿治理污染来讲，过去、未来、世界各国、不同的阶段都有。你可以研究美国，研究欧洲。包括反腐败，可以研究日本，刘志军出事了，日本的高铁之父十河信二和刘志军都是如出一辙，真的是绝了，当然刘志军还称不上中国的高铁之父，而十河信二是新干线之父，只是中国反腐败比较严厉，中国处理了刘志军，日本没有处理，但新干线通车剪彩仪式都没有让他参加，他欺上瞒下干了很多坏事，这个可以通过比较研究来进行。

当代政治学，最主要的是政治法，具体来说就是美国，美国在战后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它的利益是美国站在世界秩序上，于是美国就派出了很多智库的学者，他要了解、要研究这个世界，那么就有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这两个机构。如果研究国家就研究一个国家，那你能认识国家吗？研究儿童心理学你就研究一个儿童吗？研究中国，你光在中国能看得懂中国吗？研究中国绝对不能光研究中国，光研究中国就不能了解中国，一定是要进行比较。

所以，这些人出去基本上就是研究了10-20个国家。于是这个理论就出来了。这是新一代的学者有这个条件了，现在新一代的智库也有这个条件了，现在中国有钱了，也有这个范儿了，什么叫做范儿？现在出国他重视你，原来看不起你，都给你打发了。现在中国人一来就

说很好，赶紧来，和你谈，你说今天谈两个小时，他给你谈四个小时，滔滔不绝，他想给你说点什么，也想听你说点什么。

再有中国现在培养了一批学者，现在中国人也不是老帽了。我们八十年代去美国的时候是老帽，在美国我没有见过超市，没有见过MALL，那时候我们都拿一个《新英汉辞典》，上面就没有这个词。什么都没有见过，现在中国人一去，哟，纽约怎么就这样？！这是开个玩笑。

所以比较研究，而且美国人这套东西，我们和他们当年一样，他们当年怎么做的，咱们就怎么做，咱们甚至比他们做的还好。

任力波：

谢谢房老师，我有两个问题，一个大问题，一个小问题。第一个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下，我个人以为都已经到了智库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甚至是最关键的时期，但是中国目前的智库其实有两大类，一类是体制内智库，一类是民间智库，您觉得在这样一个关键的重要的时期，是体制内智库发展更重要一些，还是民间智库发展更重要一些？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智库的发展很重要的是学习您的研究体系，三个性，一个是中立性，一个是建设性，一个是实用性。要满足这三性，必须要在智库的队伍结构里满足跨不同学科、不同工作背景、不同的学历，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我们今天已经提到了很多关于“旋转



门”的事情，但由于目前我们党内开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党员官员的自律，那么目前党员和官员向体制外智库，也就是说民间智库转移的过程，我有一种担心，会不会把“旋转门”变成“玻璃门”？

房宁：

第一个问题我还真解答不了，你说哪个重要，我觉得这不是谁说了算的，谁干好了谁重要。但我有体会，中国体制内外的智库，各有优缺点，各自应该找到自己的这种成长土壤。我虽然没有在体制外的智库里，但我打交道的非常多，例如我现在的多国比较研究就是由世界经济科学经济会支持的，这也许是民间智库的一个优势。

官方智库虽也有优点，但我得说说它的问题。第一是它的体制问题，这个体制绝对不行，包括中国社科院在内。别的研究所说，国家都要改革，但就中国社科院没有改革，因为它是事业单位。中国最后的一块传统的阵地，就是事业单位。事业单位的问题大了。我们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哪有这好事？那不想研究什么就不研究什么，那你这是什么智库啊？你现在要学新的东西，智库永远是新的东西，这和原来那种一条道走到黑，一口井打到底绝对不一样，你要和人家的智库竞争，要知己知彼，但事业单位的软肋就是没有积极性。

任力波：

我们做的是把体制内智库的一些资源给激活了。

房宁：

那就对了，他（事业单位体制）还养懒汉，养笨蛋，还惯坏蛋。我再给你说一个，有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我向他请教怎么管理，我说我不会管理，我就学习吧，他给我讲了很多，我听了半天，我比较笨，后来我就总结了两天，一个叫做奖惩机制，另外一个叫抑制机制。你这个单位要搞得好的，一定要有奖励手段，调动他的积极性；对不好好干的还要有抑制机制。他那天说得特高兴，他后来问我，你不也是管理者，你也是个所长，你有什么奖励的手段？我说我不行，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他问，那你有没有什么惩罚的手段？我说他们给我打分。所以不光社科院，我估计所有的体制内的都有这个问题。当然并不是说没有好的机制就没有好的作品和好的工作，有。但这就是非体制化了，那就纯粹是凭良心做事了。过去我们社科院经常做一个课题，20年都没做完，后来人就死了（笑），还不是退休了。当然我说的这是极端的，它这个体制是有问题的。当然我们现在改革，当然这个改革也会很快，改革五年、十年能改好也就不错了，所以，这是体制外的优势。

体制外的优势是要找题，关键是选择合适的题目。我们对中国很多的认识源自于我们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比较，这个真的是很有帮助，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把工业化时代的上层建筑的变化基本搞清了，这是民间的智库，民间智库有基金会的形式，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就像

你刚才说的把体制内的因素激活了，这真是造福。所以，体制内体制外各有优势。

你说谁重要？谁做出重要的成果谁重要，这个是公平的，这个吹牛也没有用，所以，我们也有危机感，我经常给我们同事说危机感。因为不像高校，高校其实有学生，而且你是老祖宗，人民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这不就行了。北大他永远是北大。你工作成不成，他还是北大。你要是智库就不一样了，你在几个问题上打响了，你就脱颖而出。所以，民间智库我觉得要找点，这才行。体制内的智库要改革体制。

任力波：

第二个问题是担心旋转门变成玻璃门。

房宁：

这个不会，现在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四大问题八大方面，这是我们研究出来的。研究一个问题，我们没有研究出问题解决的方案，但我们已经受到了大大的表扬，因为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就已经不错了。

干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哪儿？共产党的体制或者说干部人事制度，或者叫做行政体制，怎么说都行，我们研究了三年，最后很满意。它的核心问题就是这四大问题、八大方面：“选拔与任用、考核与评价、激励与保障、任期与退出”。而且懂行的一听就知道这是联系在一起。这几个问题要解决。



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它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激励、保障机制，你没有旋转门就实现不了。中国这个东西必然要这么做，否则没有办法，整个政治体系没有活力，干部和官本位是有惰性的，它是唯上的，它是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看得非常清楚，现在必须要解决，问题怎么解决？西方的旋转门是非常重要的，我有一个访谈就是谈这个事。汉默尔（音）是艾森豪威尔的助手，他是1956年进的白宫，我是57年来到人间，他是美国十大杰出青年，他问中国社科院的结构，他听不明白，我说说的很清楚啊。最后他说在布鲁金斯，第一是政治家，第二是企业家，第三是媒体人，第四个是学者，而我们都是清一色的学者。因为智库是研究现实问题的，研究的是解决问题，如果都是一帮纸上谈兵的人怎

么弄？当然你也可以调查研究。什么叫做官员？现在我们讲学者型官员。那有没有官员型学者呢？这个东西将来都是混的，企业家，文化水平、理论水平都得好，现在的企业家不是过去的老粗了，现在的干部也不是过去的老粗了，所以，这种条件的形成就是体制的问题。当然我们社科院现在已经开始提倡这个东西了，特别是我们政治学所，过去我们政治学所，前任所长就说，我们现在社科院的常务副院长，中央中办的赵胜轩副主任，现在到社科院了，其实中组部安排职务是有考虑的，这个就是要这样。

任力波：

体制内可以转的，但转到体制外还是有难度的，转到民间智库还是有难度的。

房宁：

其实我们都提过这个建议，包括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关系是什么呢？我看从来没有接触过，你看我们有那么多的外交官，那么多外交官，从他们的精神境界，一辈子为国家，都在海外。外交官的孩子没有几个考上好大学的，最后都出国了，到外国也是上不好的大学。（笑）所以精神境界极其高尚，要经验、要理论，什么都有。退休以后他们干吗呢？在家特别的郁闷，心情非常的不好，浪费了，有的时候到电视台、到电台去介绍介绍，说两句，我觉得是太浪费了。你说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到大学里来教教书，到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的讲师和副教授为什么不能到外交部海外去干干，差不多了再回来，包括民间的智库，现在在中国政治体制我觉得有两个前沿



改革，一个是，我给你们说个例子，叫做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的人大，你们去看看，以他们为代表的基层人大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这个以及相关的基层市县级人大代表的选举，深刻的改变了，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和中国社会的转型和这个问题有关。第二，深圳，深圳公务员聘任制的改革，你别没有信心，公务员聘任制是一个革命。公务员职业化了，这个叫做职业背景了，已经有词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做，因为他没有职业背景。咱们拿现在退休不干的卫生部长来说，他就没有这个问题，他旋转到哪里都行，他为什么不能旋转，不是政策问题也不是认识问题，当然都有，但你就是到位了也不行，他旋转不出去了，像我这种旋转，我旋转到你那儿去也行，我再旋转到大学里也行，我再旋转到回家也行。我最希望的还是回家。

王文：

谢谢房老师，谢谢力波的问题。您刚才讲的我过去也提过，我在担任记者的时候就说过全国新闻学院的教授和副教授、讲师，应该去当两年的编辑记者再回来教新闻。

房宁：

两年不够。

王文：

现在90%以上的传媒大学新闻系的教授从来没有当过记者。经济学院应该到企业界干干，农业学院的去当农民。

今天我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房老师讲的娓娓道来，轻言细语，一个听众都没有走，我觉得非常好。非常感谢！

人大重阳也是未来要建立一个以金融研究为核心的智库，在座的各位，包括你们的朋友，你们本人如果有意向的话，都可以欢迎你们加盟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最后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房老师。谢谢您！

（结束）



网址：<http://rdcy-sf.ruc.edu.cn>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文化大厦6层

Add:6th.Floor,Wenhua Building No.59 Zhongguancun Street,Haidian District,Beijing 100872 P.R.China